

田本娜 一生献给教育事业

■ 记者 田莹

天津师范大学于6月30日举行“弘扬教育家精神，做新时代铸魂育人的‘大先生’——田本娜先生从教73周年教学思想研讨会暨终身成就奖授予仪式”，97岁的田本娜坐着轮椅缓缓入场，到场者以热烈掌声向她致敬。从1952年踏上讲台至今，田本娜始终以“不做懒惰的教师”自勉，在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不断创新。她推动了“集中识字”语文教学改革实验，培养了几代教育工作者，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，以纯粹的教育情怀，抒写了一部跨越世纪的教育传奇。

家风师恩
铭心励志

“家有闲田多种竹，家有闲钱多买书。”这是田本娜自幼耳濡目染的家训，是她祖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她出生于葛沽一个书香之家，家中藏书满架，从《三字经》《论语》到各类古代专著、古典小说应有尽有，家里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。她从四五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，父亲和母亲用一面是汉字、一面是图画的卡片教她识字，到七岁入读小学时，她已识千余汉字。

后来，她父亲开书局、办报馆，书局里的《新青年》《创造》《小朋友》等杂志成为田本娜的精神食粮。然而，幸福的童年非常短暂。她清晰地记得，1937年，七七事变爆发后，日军占领天津，父亲创办的《治新日报》因出版“号外”抗议侵略被查封，工人被捕。“困境之下，我父亲变卖家产，救出报馆的工人，自己却一病不起，于次年离世。”田本娜回忆。

生活的重担落在母亲肩上，但无论多么艰难，母亲也始终没放弃对子女的教育。田本娜始终铭记：“母亲常对我说，炕上一把剪子，灶上一把铲子，书桌上更要握好笔杆子。意思是说，要掌握技能养活自己，会做饭填饱肚子，更要读书成才。”

抗日战争时期，葛沽没有中学。田本娜小学毕业后，在家中跟随母亲继续学古诗文。明代的儿童启蒙读物《幼学琼林》《龙文鞭影》等，都是母亲指导她读完的。1946年，天津市内设立中学进修班，母亲顶住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传统压力，送她入学读书。田本娜动情地说：“我能成为大学教师，完全是因为母亲用她的坚毅和远见为我铺平了道路。”

回忆求学之路，田本娜说，自己遇到过三位恩师。

葛沽官立小学的刘伯声先生，是点亮田本娜教育初心的第一缕光。“那时候的老师多是‘全能选手’，刘先生既教语文、数学，还管着音乐课，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。”她笑着回忆，儿时自己性子倔，不爱唱歌，有一次音乐考试，无论刘先生怎么鼓励、启发，她就是不肯开口。最后，刘先生毫不含糊地给她打了零分。她的精力都用在了文化课上，成绩总稳居班级第一。有的同学怀疑她考试作

弊了，她心里又气又委屈。下一场考试，干脆把课桌转了个方向，书包往讲台上一放，当众宣布：“我就这样考，大家看着！”结果，满分的成绩单让质疑声哑了火。这份倔强与坦诚，赢得了刘伯声先生的格外关注。家里有人反对田本娜继续上中学，刘先生鼓励她：“你要乐观，要进取，不能放弃。”“达观进取”这四个字，也成了陪伴田本娜闯过无数风浪的人生座右铭。

考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（今河北师范大学）之后，郝荫圃、许亿痴两位教授为田本娜的教育之路筑牢了根基。

大学时期，田本娜凭借优异成绩提前毕业，工作两年后被调回母校。“郝荫圃教授让我教《小学各科教学法》里面的历史、地理教学法，他自己教语文、算数和自然教学法。”郝荫圃要求她必须撰写教学大纲、拿出详细讲稿、列出参考资料目录。她回忆：“他改我的讲稿，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，改完了就让我在教研室里试讲，一遍不行再来一遍，直到我能做到游刃有余。”

郝荫圃常说，教学要“从严、从细、从实”。后来，这成了田本娜带青年教师的核心理念，她要求自己的学生备课必须“过三关”，正是当年郝荫圃教授传给她的法子。

许亿痴教授的课堂，则为田本娜打开了学术研究的大门。她回忆：“许教授讲《外国教育思想史》从不用课本，把提纲写在黑板上，从古到今的教育思想就串成了一串，讲得活灵活现。课后，许教授总会列出一堆参考书，他说，课本是骨架，你们得自己添肉。”更特别的是，许亿痴喜欢以开卷的方式考试，提前给出几个题目，学生自选后去图书馆泡上十天半月，列出提纲请许教授过目，改满意了，才能动笔述答题。

这段时期，田本娜读完了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《大教学论》等大部头教育学著作，不仅迷上了外国教育史，更摸透了“读书、积累、研究”的门道，为日后编写《外国教学思想史》埋下伏笔。

一线耕耘
潜心学术

田本娜与小学语文教育研究的缘分，始于1952年。那时她读完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著作和传记，满腔热忱，一心想像他那样，到教学一线去，在实践中成为教育家。她回忆：“当我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昌黎去教书，高兴得不得了。”她收拾了整整两大箱行李，踏上开往昌黎的火车。当地师范学校的校长亲自到火车站接她，看到那么多行李，不禁笑道：“你是真打算在我们这扎根儿啊！”

半年后，田本娜凭借出色的表现被任命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主任（相当于校长）。在实践中，她明白了“好的教育是温暖的陪伴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威慑”的道理，也懂得了“一定要到教师中去，才能找准教学中的问题并逐一改进”的方法。

1954年，田本娜调回母校教育系任教，但仍未离开她热爱的小学语文教育一线。每年



田本娜

1928年生于天津。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、小学语文教育家。出版《小学语文教学论》《外国教学思想史》等著作，获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。

退而不休
火种不熄

1988年，田本娜退休，然而她的学术生涯却攀上了另一座高峰，她笔耕不辍，陆续出版了七部著作。2014年，86岁时，她凭《突出汉字、汉语特点的小学语文教学整体改革与理论构建》摘得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。

田本娜始终将“从严、从细、从实”作为治学信条。主编《外国教学思想史》时，她要求团队必须读原文。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著作尚无中译本，她派研究生去北京，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查找原始文献、逐字翻译。在编写《小学教育学》时，有部分稿件文风散漫、偏离原意，她果断退稿，“我说话直接，学术上来不得半点马虎。”

田本娜说，自己能够著书立说，离不开人民教育出版社陈侠先生的鼓励与鞭策。上世纪80年代，她发表了首篇研究夸美纽斯的文章，陈侠先生激励她：“不要只写这一篇，要打开视野，多方向延伸。”后来，田本娜着手编写《外国教学思想史》，陈侠先生一直密切关注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在这部书即将出版前夕，陈侠先生去世。她在该书序言中痛惜地写道：“非常遗憾，这本书我交给了老师，他却没能看到。”

学术上的“严”与育人中的“慈”，在田本娜身上浑然一体。她家的客厅成为许多青年教师寻求指引的“公益课堂”，她几十年如一日为他们答疑解惑。她说：“老教师有传帮带的责任，年轻人也要点燃自己心中的火种，勇敢超越前人。现在青年教师压力大，既要上课，又要发论文评职称，但不能为了评职称而评职称，不能为了数量丢了质量。要找准一个方向，长期深耕，要沉得下心，守得住寂寞。”

岁月把青丝染成白发，田本娜的人生与教育彼此照亮。今年7月，她将个人收藏的2219册图书及30袋手稿悉数捐赠给天津师范大学。这些纸本记录着她从教室到书斋、从实践到理论的漫长足迹，其中包括大量听课笔记、与一线教师的往来书信等。她说：“这不单是我个人的东西，也是教育走过的痕迹。愿青年教师能从中发现：真正的好教育，永远是从课堂里生长出来的。”

田本娜访谈
内心永远保持
对教学的热情

记者：您一直强调教育是点燃一把火，那么这把火对青年教师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怎么才能让它一直燃烧？

田本娜：简单点说，这把火就是心里得有股劲儿——对教育的初心，对学生的责任，还有琢磨教学的热情。教师不能把教书当成混饭吃的活儿。你想啊，工厂加工的零件坏了能重做，学生教歪了，能重来吗？所以这火里面得有使命感、“教不严，师之惰”，在我看来，这里面提到的“严”，不是说要凶巴巴地管束学生，而是得问自己：我这么教，学生真听进去了吗，真学会了吗？心里总想着这些，这把火就不会熄灭。

上面这些话，是对所有教师说的。要对搞教育学研究的大学教师来说，我认为还应该多到一线去，了解一线教师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，知道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啥。我当年搞“集中识字”改革，跑了几十年课堂，记了上百本笔记，最后能够成书，正是一线实践给我的底气。

记者：您已经97岁高龄了，还一直关注教育动态，平时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这些的？

田本娜：靠年轻人啊。我退休后经常在家里开“小研讨会”，青年教师、研究生们常来，带给我很多资讯，也让我有新的思考。现在微信很方便，我的学生和以前的朋友们，常转发行业内的动态和新的研究成果，我一篇篇看，在微信上和大家交流。听他们讲这些新鲜事，我就像又回到课堂上，有意思得很。时代变了，学生变了，教法也得跟着变。我想知道我当年研究的那些方法好不好用，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，更重要的是，每天这么关注着，我觉得自己还没离开教育这一行，还能做点事，挺好。

记者：现在有些学生沉迷手机，教与学都过于依赖技术，甚至使用人工智能，您觉得在传统的教育智慧当中，有没有应对的方法，还是只能被动接受？

田本娜：孔子说，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，这其实也是传统教育智慧的核心——教育得围着学生转，讲究的是引导，而不是替代。就说学生沉迷手机吧，光靠禁止肯定行不通，关键是要给他们提供更有吸引力的东西。再说依赖技术，前阵子我让护工小姑娘帮我在手机上装了“豆包”，试用后真觉得人工智能很厉害。但是，我们也要防止教师备课时过于依靠人工智能，自己反而成了“课件播放员”，把最该有的师生互动、思维引导丢了。我们当年评课，最看重的就是老师能不能抓住学科的本质，能不能根据学生的反应随时调整教学。这种面对面的点拨，跟着学生节奏走的启发，是任何技术都替代不了的，是教育的“魂”。

记者：您在接受采访时说，回天津师范大学就像回家。这所学校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
田本娜：时隔多年再次踏进校门，让我想起当年跟同事们一起备课、跟学生们一起讨论的日子，心里很踏实。能带给我们这种感受的地方，不就是家吗？我大半辈子都是天津大师的老师，《小学语文教学论》是在这儿写的，“集中识字”改革是在这儿推的，一批批学生、青年教师也是在这儿带出来的。这次学校给我颁发终身成就奖，我深深感受到学校对我的鼓励和关爱。我把书、手稿捐了，把奖金捐给了学校的教育学部，就是想让我的经验和热爱能永远留在这儿。

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讲述

《三叉戟》之后吕铮再推刑侦力作《双刃剑》 写出平凡警察的英雄梦

口述 吕铮 整理 何玉新



作家吕铮

已看待警察这个职业以及看待社会的视角都发生了变化，火候差不多了，有信心把一个警察“刀刃向内，刀尖向外”的故事诠释出来，于是开始动笔写《双刃剑》。

我刚参加工作时，在北京某个派出所，师父带着我和另外几个警察去抓一个犯罪嫌疑人。我拿着警棍冲进去时，就已经开始哆嗦了。门口是狭长的过道，两侧堆满垃圾、杂物，嫌疑人拿着斧子奔我而来，师父在后边一扒拉我，自己往上冲，场面十分混乱。我抓住那个嫌疑人的时候，自己抖如筛糠，感觉像低血糖的状态。后来我把这个情节写进了《三叉戟》。

前几年，师父找我，说你要有时间一起吃个饭，跟那谁谁谁。我吓了一跳，这名字似曾相识，再一想，这不是我抓过的那个人吗？师父说，那个人从大牢出来了，第一件事就是去派

“刀刃向内，刀尖向外——吕铮《双刃剑》新书发布会”于9月13日在北京举办。腾讯视频总编辑张恒、《十月》杂志原主编陈东捷、《双刃剑》策划编辑张引墨与作家吕铮一起做客新书发布会现场，与读者展开交流对谈。吕铮曾凭《三叉戟》享誉文坛、影视界，《双刃剑》是他的最新力作，讲述案件证人潜逃，董刃、江锋、赵阔、苏晓雅四名刑警因监守失职被降职、边缘化。十年后，探长董刃重新揭开尘封旧案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

在发布会上张恒表示：“我评判剧本、小说的标准有三个，即合理、有趣和突兀。吕铮的故事有趣、出人意料，下笔极具真实感，在这样的基调下，他更写出了平凡警察的喜怒哀乐，写出了他们的英雄梦。”吕铮也现场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和创作经历。

《双刃剑》取材自现实
每个人物都有复杂性

好多朋友一提到我，就说吕铮是《三叉戟》的作者，这成了我的标签。但是，《三叉戟》是我在2015年构思、2016年创作的，如今还是我的标签，我感到很不满足。在2024年，我觉得自

写出人物的过人之处
也写他们的性格缺陷

写《双刃剑》时，我在小黑板上记下三句话：一是细节处理要比同类作品强；二是每段对白、每个过桥，哪怕是一个场景描写、一段情绪弹幕，都要有信息量，要有交代，要能衬托整个小说的意象，其后才是对故事情节的推动；三是要奇在其外，跳出警察的身份去看警察。

我建了四个文件夹：对白、人物关系、人物、细节。动笔的过程，就是把这些零散的东西整理出来的过程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，好多碎片可能只有一句话。可能有人觉得我写得快，十个月写成一部小说，殊不知，我之前消耗了很多年，一直在积累素材。

这些东西浮在表面，而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人物的“魂”，把生活中的真提炼成可以让人相信的艺术真实。我要写出他们的过人之处，写出他们性格的缺陷，写出他们内心的挣扎。当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呈现在我面前时，当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物才算成功。这也正是我心目中好作品的标准：人物立体，人物关系牢固，以人带事，一切不落惊险奇特，落人心。

当时我儿子不到7岁，有一天他问我：“爸爸，警察都是好人吗？”他年纪太小，我只能说：“是，警察都是好人。”他接着问：“爸爸，如果警察干了错事，还是好人吗？”这句话把我问住了，我想了想说：“警察如果干了错事，可能那个阶段他就不算所谓的好人了，但如果他能正视自己的错误，就还是好人。”他又问了第三个问题：“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，又变成好人

了，那他是好人吗？”我说他是好人。这段对话我用在了《双刃剑》里——孩子看似无意的发问像一把尖刀，一次一次地刺痛主人公董刃，让他久久不能忘怀。

相对于“作家”，我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写作者、亲历者、在场者。我觉得应该平视这个世界，甚至敢于靠近所谓的“黑白灰”，才能拓展信息量，成为一个更持久的写作者。

“恨活儿”的警察才是神探
他们永远不会袖手旁观

我23岁那年，误打误撞破了一个在北京行骗七年的案子。一个雨夜，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，关入看守所。刚回到车里，法医就跑来了，告诉我，经过体检，那人是女的！

这个女扮男装行骗的案子轰动一时，好多记者来采访，其中有一个记者说，我自己给你5000块钱，你把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都告诉我，我想写一个小说。我肯定不能答应，因为案子还在侦查阶段，还没向检察院移送起诉，更没判刑，不能给卖了。到判刑以后，我也没卖，我想，这么好的故事，我能不能自己写一个小说？

以这个案子为原型，我写完了小说《黑奔》，投给出版社。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小说，出版后，我从出版社拿到三本样书出来，在繁华的朝阳门内大街上抱着书狂奔。那一瞬间，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。一个没有写作基础的人，通过努力，能呈现出一个作品，首印5000册，能让5000人看到这个故事，甚至可能有一天会拍成影视剧，让更多的人看到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件特别棒的事。

“恨活儿”的警察才是神探。我采访过的所有干得好的警察，都不是拿所

谓的破案当自己职业规划、职业成长的阶梯，而是真好这口儿。由于办案经历多，他看到社会深层次的东西会更多，结识的人会更多，掌握的信息量会更大，他的人生也会更精彩。所以别怕累，丰富的经历是最好的宝藏。

我采访过丰台分局一个刑警，他给我讲了一件事。一个老人来报案，说锁在家门口电线杆子上的自行车丢了。可是，一辆旧自行车顶多值几十块钱，报什么案呢？老人说，不是钱的事，原来我骑着那辆自行车，驮着我老伴儿，去做放化疗，她坐在车后座上，眼瞅着一天一天越来越不行了，后来人就没了。我没女儿，突然觉得，全世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每天出门看到那辆自行车，觉得我还不如那么糊涂，但自行车突然丢了……

一瞬间刑警就懂了，跟老人说，您甭管了，这事儿我们办！他说服领导，穷尽各种手段，我们的术语叫“警务支援”，24小时就把自行车找回来了。老人送来一面锦旗，他们把锦旗挂在办公室墙上正中间的位置。我觉得，如果一个警察一辈子能破几个这样的案子，并不比那些惊天大案差。我想写的就是这些警察。

前几年我采访一个浙江的老刑侦，他跟我说了四个字，“主动下场”，又解释说：“我告诉我的徒弟，不准备、没准备，你要去干；你恐惧，你要去干；你觉得这个事可能干不好，你要去干；你同时在干无数件事，抽不出时间，你也要去干。”这段话太牛了，写小说也是一样的感受。

人这一辈子总得信点儿什么，哪怕在某个阶段碰到挫折。要是不信，所有的动作、心态都会变形。就像我刚刚完成的小说《梦探》，里面写了一句台词，只要你信，哪怕一缕微光，也能照亮世界。警察跟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永远不会袖手旁观，永远挺身而出，如果每个人都像警察一样，这个社会就会更好。